

# 李调元、张问陶与李白

吴明贤

李调元(1734—1802),字羹堂、赞庵、鹤洲,号雨生,又号童山,四川罗江(今属四川德阳县)人。张问陶(1764—1814),字仲冶,号船山,四川遂宁人。他们二人同为清乾嘉时代四川著名学者和诗人。

李调元和张问陶的家乡与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出生的彰明县都相去不远,江山之助,风俗所染,李调元和张问陶在治学和诗歌创作上,都深受同乡前贤李白的影响。

李调元和张问陶对他们的同乡前辈诗人李白都是十分景仰和敬慕的,这种感情,洋溢在他们诗文的字里行间,不绝如缕。

“若问谪仙推我李”,李调元对李白的才华是异常佩服的。“李杜锦绣肠”“诗思李白豪”,他赞美李白胸藏锦绣之文,诗歌飘逸的豪放风格。“君不见太白漂泊黄河间,挂席欲进波连山,一朝待诏金銮殿,御手调羹供奉班。”“君看太白后,谁无惭金銮,坐令英髦辈,府首目屈蟠。”对李白因才华出众、诗思敏捷而令唐玄宗御手调羹及奴使高力士的傲岸不羁的性格表示了由衷的赞美之情,而对李白平生的不幸遭遇却深为愤慨不平。他在自己的诗中不止一次地写道:“我闻诗人例穷蹇,失意往往追风骚,奇才抑塞古亦有,酣歌据地真吾曹。……不见生入玉门之班超,不见东海骑鲸之李白。”“李白骑鲸去不还,谁欲搔手问青天。”

“昌黎命蹇遭磨蝎,太白游仙欲跨鲸。”“我蜀多才人,皆为文字官,皆不择细行,又皆窜夷蛮。唐之李供奉,长年酒家眠,朝赋清平调,暮窜夜郎天。”他赞扬李白是“不择细行”的“奇才”,认为李白同历代著名诗人一样,平生穷困失意,晚年还被流窜夜郎,贬谪“蛮夷”之地,对此他深表同情。“古人不得意,大抵皆放颠,吁嗟俗眼人,焉能窥圣贤。”指斥那些世俗之人对李白一类狂放不屈的失意圣贤的不理解。他曾到李白的故乡去凭吊李白:

“太白祠前草欲芜,米颠碑迹半模糊。平生亦有清平调,诗到匡山一字无。”对李白祠前的荒凉冷落表示了遗憾之感。“匡山读书近吊李,支机问卜遥寻严”,对李白表示了深深的哀悼之情。“往日风流传白杜,近来云散忆青莲”,“李白岩前倘相忆,凉风天末意如何?”

“李白诗空好,刘伶去不还”,“夙仰奇文万丈光,君于李杜别生芒”,“久思来座周敦月,同访曾藏李白云”,“陶潜如果饮,李白也能杯”,他在送别寄赠或宴请朋友时,往往以李白拟人或追忆李白,表现了他对李白的敬慕亲切之感。“流涎每向曲中搢,不见青莲不

举杯”，“未同李白三杯酒，先吃卢仝七碗茶”，“酒渴因惭李，诗穷不让梅（自注：谓李太白梅圣俞）”，就是饮酒赋诗他也念念不忘李白。“独弹古调无人识，疑是青莲作后身”，他自比李白。“余本今之诗狂者，非李太白不取也”，他毫不掩饰地自诩为诗狂，并向李白学习。“我诗颇向谪仙偷”，他承认自己的诗歌是继承了李白，其中某些诗句也是从李白的诗中“偷”来，即化用或借用来的。他甚至“下笔直搗三峡江，翻江搅浪不肯住，竟欲手摘龙耳剝鱼腹拔鲸尾，以与万丈之李杜争豪强”，要与李白一争诗歌的高下了。正因为李调元景仰敬慕并继承学习李白，所以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也将他比做李白：“仰天上之谪仙，群推太白”“谪仙已入罗浮梦，几度招呼总不闻”。不难看出李白在李调元的心目中是有着崇高的历史地位的，对李调元的影响也是深刻的。

“乡人思李白”，同李调元一样，张问陶对唐代著名诗人李白这位同乡前辈也是异常景仰敬慕的。他在《醉后口占》一诗中写道：

锦衣玉带雪中眠，醉后诗魂欲上天。十二万年无此乐，大呼前辈李谪仙。

在《代启答毕秋帆先生并上近诗一卷》中又写道：

自磨碎墨写天真，知为苍生为鬼神。莫讶上书狂欲死，山东李白是乡人。

他以自己与李白同乡而感到无比骄傲自豪，醉后写诗也大声呼唤着这位同乡前辈的名字。他对李白一生迭遭挫折的不幸遭遇也深感不满：“上帝居然召长吉，世人谁竟杀青莲。不真夭折非才鬼，岂有功名到谪仙。”对李贺的早死不寿和李白的功名不遂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地擘雍梁山自好，诗留李杜我何题”，他对李白的诗歌是十分赞赏的，认为自己在李杜的面前是无法下笔的。张问陶在寄赠送别或称颂赞美朋友时也往往以李白相许。他赞美陈小筠“何止诗登李杜坛”，推许李并庚“配得青莲古姓名”，称赞宋之山“疏放如谪仙”，颂扬袁枚“谪仙非谪乃其游，汗漫才名散不少”，称颂洪亮吉“作道士装”的狂放不羁“疑是唐朝酒人李太白”，送别汪汝弼“莫对桃花怜李白，汪伦也是谪仙人”。他评论诗歌也以李白作标准：“诸君刻意祖三唐，谱系分明墨数行，愧我性灵终是我，不成李杜不张王。”张问陶也常常以李白自比，如“大乐三千傲李白”，他在开怀畅饮的欢乐时刻就以狂傲不拘的李白自喻；“我恐成伧鬼，人疑是谪仙”，当他害怕自己成为粗俗之人的时候，别人却怀疑他是李白再生；“旁人莫讶豪情减，我本蓬壶一散仙”，“胸中自有真意，错被人呼酒狂”，他同李白一样，豪情飘洒，诗思飞逸，真意独存，也是一个与现实社会不合的“仙人”，却被别人错误地呼为“酒狂”。“万里风沙悲独往，旧时李杜媿齐名”，他俨然以李白自居，将好友洪亮吉比做杜甫。正因为张问陶景仰敬慕李白而且有着李白式的狂放，故“爱我猖狂呼李白”，他同时代的著名学者洪亮吉也就以李白称呼他，他还博得了前辈诗人袁枚的赞扬。不难看出，张问陶也是深受李白的影响的。

## 二

被袁枚称为“西蜀多才君第一”的李调元，对李白及其诗歌创作的研究和整理工作是很

有成绩的。首先，李调元针对钱谦益在注杜诗时说“李白，山东人，父为任城尉，因家焉。钱希易《南部新书》亦同，元微之作杜甫墓志，亦云山东人李白。盖自隐于徂徕，时人皆以山东人称

之，故杜诗亦曰“山东李白”的观点，对李白的出生故里作了科学的考辨。他专门写了《李白故里考》一文：

人莫不自耀其所居之地，而欲耀其地，莫不先夸其地所产之名人，即偶尔流寓，亦必聚而讼之。所谓争此朽骨如地球也。然不必争而争之，未有如我彰明之李太白者。自唐李阳冰序其文，刘全白撰其墓碣，皆云：广汉人。而论白者，或曰陇西、或曰山东，不知白实生于绵之巴西也。唐范传正志其墓曰：白，凉武昭王九世孙。昭王陇西人，隋末子孙以罪徙西域。神龙时，白父客因西域逃居绵之巴西，而白生焉。白既隐岷山，举有道不就，隐匡山，苏颋为益州长史，见异之，则是白始终一蜀人也。中间荡迹纵酒，以张洎之谗，浮游海岱。子美所谓：汝与山东李白好。盖白时流寓山东，亦犹子瞻之在黄州，而以临皋歧亭之地，号为东坡居士也。如曰太白山东人，则子瞻亦黄州人哉！彼《南部新书》不察其实，遽云白山东人，父为任城尉，因家焉。而即以任城令厅有白之祠尚存为证，何其谬乎！古语云：远望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不亦悲乎！

文章首先指出李白出生故里是“不必争而争之”的遗憾事情，其所以“聚而讼之”，皆因“人莫不自耀其所居之地”及其地之名人。接着便引用大量史料证明李白出生于蜀，始终是蜀人。最后以苏轼在黄州为例重点驳斥李白为山东人的说法。此外李调元还在自己的诗文中不止一次地申说李白是蜀人。他在《重刻李太白全集序》中说：“彰明，古昌明，即太白所生地。”又在《秋兴》二首之二中认为“唐之李供奉”，就是“吾蜀多人才”的一例。

其次，李调元对李白诗歌的研究也表现在他对李白诗歌的评论上。李调元“酷爱陶渊明、李太白、杜少陵、韩昌黎、苏东坡，丹铅数四”，对李白等人的诗是认真阅读并进行过比较的。他说：“凡诗赋，一代有一代之雄”，“李太白，唐之雄也。”认为李白是唐代诗坛的皎皎者，并在《重刻李太白全集序》中高度评价了李白的诗歌：

太白诗根柢风骚，驰驱汉魏，以遗世独立之才，汗漫自适，志气宏放，故其言纵恣傲岸，飘飘然有凌云驭气之意，以视乎循规蹈矩含官咀商者，真尘饭土羹矣！盖其仙风道骨实能不食人间烟火，故世之负尸载肉而行者，望之张口咋舌，譬如天马行空，不施控勒，其能绝尘而追者几人哉！且太白亦非徒阔落浩荡而无涯涘也。今之人半以子美沉酣六籍，集古今大成，为风雅正宗，使追步者有径可寻，有门可窥，故谭艺家迄今奉为矩矱，遂视太白为登天然不可及者，此大谬也。以太白之仙才，文质炳焕，发为诗歌，无体不备，无体不精。当其时使无子美，则后之人寻思玩绎，于摆脱骈骊跌宕不群之外，求其声律，固自有轨辙之可遵，亦何至怖如河汉也。太白诗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又曰：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又尝言：将复古道，非我而谁。则欲括风雅之源流，明著作之意旨，舍太白其将何师乎！世之言诗者，不问津于太白，而先以子美为宝筏，是犹所谓断港绝航而望至于海也。其视蓬岛十二楼，何啻三千弱水之隔乎！又安望溯而两汉之源以驾扬马而上哉！

他在《诗话》中又说：

唐诗首推李杜，前人论之详矣。颇多以杜律为师，而于李则云仙才不可学，何其自画之甚也？大约太白工于乐府，读之奇才绝艳，飘飘如列子御风，使人目眩心惊；而细读之，无不有段落脉理可寻，所以能被之管弦也。若以天马行空，不可控勒，岂五音六律亦可杂以不中度之乐章乎？故余以为学诗者，必从太白入手，方能长人才识，发人心思。王渔洋曾有声调谱，而李诗居其半，可谓知音矣！

在这两段评论中，李调元探源讨流，详细地论述了李白诗歌继承风骚和汉魏诗歌的优良传统，细致地分析了李白诗歌豪迈不羁、纵恣傲岸的诗歌风格，并比较了李白与杜甫诗歌的不同之处。在充分肯定李白乐府诗的高度艺术成就的基础上，批评了那种认为李白诗歌不可追

踪学习的错误看法，认为李白诗歌“于摆脱骈骊轶荡之外，求其声律，固自有轨辙之可遵”，仍然是有规律可寻的。因而他进一步强调学诗“必从太白入手，方能长人才识，发人心思。”否则就不可能追踪前哲，溯源汉魏。李调元认为学诗必从太白入手方有成就，未必尽然。但他对李白诗歌艺术风格的分析，特别是对李白乐府诗的认识还是颇为精到的，其对李杜的评价也是颇有见地的。李调元在《诗话》中还说：

如太白起句云“犬吠水深中，桃花带露浓。”又云“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随手拈来，俱如奇峰峭壁，插地倚天。……太白与崔颢皆盛唐人，其时风气相似。《凤凰台》诗，太白自咏凤凰台耳，人乃以为太白学崔颢《黄鹤楼》而作，何其小视太白也！太白仙才，岂拾人牙慧者？而更作俚语有“一拳打倒黄鹤楼”之句，俗子以伪乱真，可恨如此，乃知小说之误人。

认为李白诗歌不事雕琢，自然美好，不事模拟，富于创造，并辨析了李白诗歌的真伪，斥责了那些盗用李白之名作伪的俗子，这些都是颇为中肯的。其次李调元还比较分析了李白与杜甫诗歌不同的风格特征，他指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太白诗也。又有‘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之句，此殆公自写照也。而杜少陵诗‘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又不似称白诗，亦直公自写照也。”他又说：“人各有所长，李白长于乐府歌行而五七律甚少，杜少陵长于五七律而乐府歌行亦多，是以人舍李而学杜。盖诗道性情，二公各就其性情而出，非有偏也。使太白多作五七律，于杜亦何多让。若今人編集，必古今体分凑平均，匀则匀矣，而诗不传也。”指出了李杜诗歌风格、体裁不同，各有优长，都是他们性情的反映。当时选家褒贬抑扬的错误做法，影响了诗歌的流传，这是很有见地的。再次李调元还探讨了李白诗歌的继承渊源，他说：“李诗本陶渊明，……李与陶似绝不相近。不知善读古人书，在观其神与气之间，不在区区形迹也。如‘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岂非《桃源记》拓本乎？”李白《山中间答》一诗抒发隐士生活的闲情逸致，暗用陶渊明《桃花源记》，确与陶在神气上有着相似之处。李白学习汉魏六朝诗歌，自然也包括陶渊明。李调元认识到这一点，指出李白与陶诗的相通之处，可见他对李白诗歌是研究颇深的。

李调元对李白诗歌研究最突出的是体现在他对李白诗歌的校刻整理上。李调元从小就酷好读书，十八岁游浙时，“书籍得恣窥”。其父又为他“广延师与友”，因而知识广博，学问深厚：“百家探讨析亥豕，六艺辨析遵止戈。断字能知日月蚀，阙文姑任风雨磨。汉隶车马推石鼓，张草蛇蚓分藤萝。画肚以指各有悟，钳口卒读俱无讹。”对古代典籍有着深厚的研究辨析和校勘整理的能力。李调元还好收藏书籍，世代为藏书之家，“调元家世藏书，有楼五楹，名曰万卷，分经、史、子、集四十厨，内多宋槧，抄本犹伙。”可见李调元见过许多宋刻的稀世珍本书籍。再加上清代“重修永乐大典，采遗书开四库，于是人间未见之书，骈集麇至；石渠天禄，蔑以加矣”，当时李调元正“监司畿辅，去京咫尺，而向在翰院同馆诸公，又时获鳞素相通，因以得借观天府藏书之副本。每得善本，辄雇胥录之。始于辛丑秋，迄于壬寅冬，哀然成帙，真洋洋大观矣”，说明李调元读书不少，这为他的整理校刻工作准备了充分的有利条件。又因为他自己是蜀人，于是“各书中于锦里诸耆旧诸作尤刻意搜罗”。李白为蜀人，其诗文自不例外，他说“余自束发授书，即喜太白所为诗歌文章，每手一编，朝吟而夕览，其藏之篋司有日矣。”困于乾隆甲申岁（1764年）与邓在栢一起校刊合刻了《太白全集》。这个李白全集的校刻本共十六卷，其中收李诗共九百八十七首，古赋八

篇，表书序记颂赞等文共四十八篇，计十一卷；诗文拾遗一卷五十一首；此外附录四卷，收历代赞诵李白的诗文一百八十四首，丛说一百三十七首及《李白年谱》。与同时而稍前的王琦注《李太白全集》（成书于乾隆戊寅，即1758年）相较，所收诗赋全同，文缺《奉饯二翁寻桃花源序》一篇，在“诗文拾遗”内缺《杂言用投丹阳知己》、《汉东紫阳先生碑铭》、《杂题四则》，多出《别匡山》，而附录所集诗文及丛说，全见于王本而远不及王本的详博，《李白年谱》及谱后的说明皆与王本同，而缺序志碑传。但不可否认，这个本子仍为我们今天研究整理李白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珍贵的历史资料，是应该充分肯定和引起重视的。

### 三

如果说李调元重在李白及其诗歌的研究和整理工作的话，那么张问陶则重在继承和吸取李白诗歌的创作经验，故其《船山诗草》刚问世，时人便有“青莲再世”的美誉。

张问陶生活于清王朝由盛而衰这一历史急遽变化的转折时代，资本主义因素正在封建生产关系的母体内迅速成长，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方面的民主主义因素开始萌芽，诗坛上“性灵说”的出现则正是这种历史条件的产物。“性灵说”继李贽“童心说”，公安三袁“性灵说”之后，主张抒发情感，表现个性，描写真实，矛头显然是对准宋、明理学的，具有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平等、自由、民主的启蒙性质。这种反封建礼教束缚，大胆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追本溯源，其中不无李白的影响。张问陶论诗亦主性灵说，他在《壬戌初春小游仙馆读书道兴》一诗写道：“一步离身已换形，不应空守握奇经。五花八陈因人妙，也似谈经主性灵。”因而他主张写有“性灵”的诗：“笔墨无功性灵出，一痕花影一痕秋”，“因无清白眼，各有性灵诗。”

从写有性灵的诗这一原则出发，张问陶在诗歌理论上主张抒写真情实感，表现自己的主观个性，反对无病呻吟。他要求诗人“胸中自有真意”“自磨碎墨写天真”。所谓“真意”“天真”，即自己主观的真实情感，这种情感没有矫揉造作，无须掩饰。“偶凭真气作真语，无端落纸成诗文”，“无意为诗忽有诗”，并不是为了写诗而写诗，而是客观生活反映在自己的头脑中，灵感忽来，无意于作诗之时写出来的诗歌才是真正的好诗。因为这种诗“但留真意境”，具有“真气韵”，是有性灵之诗。所以张问陶提倡诗中“有我”，诗中“有情”，他说“下笔先嫌趣不真，诗人原是有情人”，“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不难看出张问陶是主张将自己的情感融入自己的诗歌中去的。他反对刻意求新之作，他在《论诗绝句》中写道：“妙语雷同自不知，前贤怨恨我生迟。胜他刻意求新巧，做到无人得解时。”“子规声与鹧鸪声，好鸟鸣春尚有情。何苦颛顼书数语，不加笺注不分明。”认为诗歌不应刻意追新求巧，使人难解；也不必冥思苦索，强为用事。他主张天机自然，清新质朴，认为“无人赞处奇诗出，信手拈来险韵牢”，“谩语烂言却近真，乱头粗服转丰神”，“乱头粗服偏神似”，诗歌应出之自然，即使是乱头粗服，只要是自然生成，也会神采飞扬。因此他反对一味模仿前人，刻意雕饰的作品。他说：“文章体制本天生，只让通才有性情，模宋规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须争。”“规唐模宋苦支持，也似残花放几枝。郑婢肖奴门户好，出人头地恐无时。”“识字何须问子云？强依篆隶转纷纷。写书累煞诸名士，

擗管迟疑画说文。”认为模仿前人就不会有自己的创造，就会千篇一律。“肯信雕虫真小技，古今从不废风骚”，“莫须矜颡祭，集腋要成裘”，“雕文镂彩太纷然，开卷沉沉我欲眠。”那些堆砌典故，刻意雕饰的作品实在缺乏感人的艺术力量。张问陶对诗歌创作的这些认识，与李白主张清新自然，反对形式束缚和雕饰是一脉相承的，有着许多共同之处。这与他们都主张思想的自由解放是密切相联的。

在这些文艺认识的指导下，张问陶的诗歌襟怀恬淡旷远，风格清新自然，有淳雅纯真之美，无矫揉造作之态，字里行间，充溢着真情，其中不乏李白的影响。顾翰说他的诗“飘飘有仙气”，“感慨跌荡，脱尽古人窠臼”，“欲歌欲泣，情见乎辞”，以为太白复出，这是很有道理的。

张问陶自称“余不喜作乐府”，但从他的诗歌中可以看出他对李白的乐府诗却是有所继承和借鉴的。请看《醉歌行》：

古人不能饮我杯中酒，我今不醉更何有？不能和我醉后歌，今我不乐当奈何。天生万物亦偶然，相逢莫叹囊无钱。举首堂堂对白日，世间何物为神仙。春风吹拂人，醉卧天下暖。眼中不必名山大川千万里，耳中不必鸾笙凤吹迎风起。但使开樽且放歌，一杯笑向风尘里。武安侯，程将军，灌夫视之曾不一钱值，可怜富贵真浮云。

诗中写及时行乐，醉酒尽欢，对功名富贵表示鄙弃，流露出诗人对现实的不满与愤恨，气势豪迈，语言奔放，与李白的《将进酒》在内容和风格上颇为相近。此外如他的《神驹篇》描写良马，气势磅礴；《击竹篇》对贤士不遇的不平，感情激昂；《寒夜吟》抒写月夜思妇的寂寞，深沉委婉，无不与李白的一些乐府诗歌相似，显然受有李白乐府诗歌的影响。李白的绝句，无论抒情写景，还是送别怀人，往往出语自然，韵味深远，得到人们的喜爱。张问陶的绝句创作，或描写山水景物，或送别怀人，或讽谕现实，往往清新淡远，韵味浓深，颇得李白遗韵。如《嘉定舟中》二首：

凌云西岸古嘉州，江水潺湲抱郭流。绿影一堆漂不去，推船三日到乌尤。  
平羌江水绿迢迢，梦冷峨眉雪未消。爱看汉嘉山万迭，一川苍翠一停桡。

这两首诗是从流动的舟中写乐山胜境的。前一首写乐山的雄奇壮丽：江流潺湲，抱郭而流；凌云高耸，乌尤雄踞。葱茏的山影倒映水中，影影绰绰，漂之不去。后一首写放眼远望，以奔流不息的平羌江和白雪未消的峨眉山为远景，进一步写出乐山的风景之美。这两首诗就很有李白绝句的神韵。

张问陶的诗歌在艺术上也对李白的诗歌有所继承和借鉴。张问陶的不少诗歌，语言朴素自然，明朗真率，音节和谐流畅，能唱易记，就呈现出李白诗歌“慷慨吐清音，明峭出天然”的特色，具有民歌的风味。且看他的《寄人》四首：

幽人月下来，衣上秋蟾影。一别几春风，江南花树冷。  
思君春梦绿，遥见江南山。离心如日月，萦绕何时间。  
草长莺乱飞，人烟聚高柳。虚空履綦绝，谁听听鹧鸪。  
君家近蓬岛，菖蒲花紫茸。与君约游仙，相期海上峰。

诗人回忆与“幽人”月下交往的深情往事和别后的魂牵梦绕，春来的冷落孤寂及期望重会的深厚情谊，曲折起伏，摇曳多姿，流丽中含清新，同李白的《秋浦歌》、《越女词》真有异曲同工之妙。张问陶的诗歌空灵缥缈，形象优美，感情动人。如他的《得内子病中札》用

比兴的手法抒写自己对病中妻子的忧思及阔别经年的离愁，就十分真挚感人。再如他的《重庆舟中和亥白》之二写万籁俱寂的深夜，自己独立船头，流连风月，对十万人家的山城的深切挚爱；《重庆》：“一字帆樯排岸直，满城灯火映江寒”，写交相辉映的万家灯火的山城和千帆排列的长江、嘉陵江，仿佛优美的图画，而自己的内心境界亦融化其中，的确是“诗中有我”，“诗中有情”。这些诗歌情真景美，自然清新，受李白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此外张问陶的诗歌直接化用李白诗文的地方亦不少，如“不封万户侯，不识韩荆州”化用李白《与韩荆州书》中的句子；“举觞邀月月在手”化用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句，更是受李白影响的明证。

自然，张问陶并非李白，由于时代和经历的不同，张问陶的主观个性和思想气质并不与李白完全一致，这就决定了无论他们的诗歌理论还是创作实践，都有着显然的差异。特别是张问陶的才力不可能与李白匹敌，其思想亦不如李白的解放与豪放，故其诗歌虽学习、继承并借鉴了李白诗歌创作的经验，但其成就和影响却远不如李白。他的诗作虽抛弃了袁枚“耽游戏”的不良倾向，但仍有部分篇章却近于狂野。有人说他的诗“叫嚣恶浊，绝无诗品，以其谐俗，故风行天下，至今熟传人口，实非雅音也。”抑之过甚，并非尽然如此。但近俗近恶的毛病确实存在，指出这一点是很有必要的。

---

(上接第23页)

对象是由人、财、物等多种因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同时它还与其他各系统发生各种形式的联系。因此，为了达到优化管理的目标，应该把重点放在整体效益上，对管理对象进行综合分析。这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了解组织中各种因素、各种职能的联系、懂得一个组织中某一部分的变化将如何影响其他各个部分，以及这个组织与其他组织乃至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为了提高整个组织活动的效益而采取行动。

当然以上三种能力虽对所有管理者都十分必要，但在不同层次管理活动中，对于管理能力也有不同要求。一般地说，下层管理者主要是专业技术能力和人事组织能力；而上层管理者则相反，综合分析能力才是最重要的能力。一切高层次的管理者可能缺少专业技术能力，但这可由他的部下来补充，他仍会成为一个有效的管理者。但如果他的思想技能、综合分析能力不强，就可能危及到整个组织的成功。

总之，管理者应通过实践经验总结，培训和自学等方式提高自己的上述素质。凡具备了这些素质的管理者都必然会使主体性发挥得更充分、科学，也必定能加速管理工作的现代化进程。